

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

林美清**

摘要

放逐，為文學領域一項重要的母題。就寫作而言，任何文本皆為放逐的產物，因為，作者透過虛實交錯的形式，營造出提供自我漫遊的空間。本文探討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首先即以「書寫」為出發點，並與空間、時間與史詩等議題進行對話。

臺灣「賦」作為抒發個人心緒的載體之外，其空間亦呈現出一體兩面的隱喻。其一，營造理想空間，大量書寫物產、山水與風俗，寄託個人生命意義的思索。其二，則係如實陳述現實世界中孤立無援的狀態，尤其透過臺灣四面環海的地理性，突顯出此特質的存在。

再者，時間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時間作為人類生命的容器，也存在觀念和生命意義的實踐。而清代臺灣賦中，「史詩」則為時間意識的延伸。大量記載的歷史事件，可以解讀出「臺灣」的放逐性——皆為流亡政權或亂賊的聚集地；再者，史詩也是表述政治認同的方式。放逐書寫必然存在著「返鄉」的命題。在清代臺灣賦中，也藉由歷史事件的追溯，進行滿清皇威的歌頌，進而達成政治信仰上的回歸。無論是山川物產的書寫、史詩的堆砌與空

* 本文原名為〈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曾發表於2010年4月22日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臺灣賦學術研討會」，承蒙與會學者李時銘教授、高桂惠教授，以及學報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E-mail: ching@mail.cgu.edu.tw。

間的漫遊，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即是一種從內由外的空間運動，也是由外向內探索生命意義的表述。

關鍵詞：放逐意識、清代、臺灣賦、空間、時間、史詩

一、前 言

「放逐」(exile)是人類歷史常見的政治懲罰手段，也是文學中重要的母題之一，主題不外乎呈現思鄉情懷、時空錯失與身分認同等面向。近年，亦有類似名詞如「離散」(diaspora)的出現。學者范銘如、廖炳惠與李有成等皆有相關論述，如范銘如在探討海外留學生小說時，認為學者普遍皆以「放逐這個較悲情的概念」來詮釋此現象，但對照艾咪·康明斯基(Amy K. Kaminsky)放逐的定義——「必須是被迫的，『自願的放逐』畢竟還有選擇的餘地。」¹所以，文本呈現的應是「可以返國卻自願選擇留下不歸者」狀態，明顯和康明斯基定義的放逐有所出入，改以「離散」代之，較為符合這種型態。²不過，就文本、主題源流與時空背景來看，「離散」和本文所談的「放逐」，顯然具有相當的差異性，故不多作討論。

本文焦點鎖定於清代臺灣賦，研究其「放逐意識」的呈現。主要使用文本為許俊雅、吳福助教授合編的《全臺賦》為主。有關臺灣古典文學中的「賦」體，部分有繼承著先秦楚辭華麗的辭藻與山水花草等繁複意象；同時，也兼具漢賦中藉由對問、比擬與想像，烘托出政治教化的創作模式。當然，也不脫離抒情言志的傳統，以及，後來日治時期結合本土閩南語的遊戲筆墨，足以見得臺灣賦存有諸多可供深入鑽研的命題。而本文探討的核心——「放逐意識」，也和上述的觀察具有部分重疊之處。

¹ 范銘如(2008)，《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頁 130。

² 范銘如(2008)也提到因政治迫害流亡海外小說家聶華苓，明顯符合康明斯基所定義的流亡(或稱放逐)，但多數小說若稱作流亡則仍需斟酌。又，范銘如提到「離散」這個觀念時，追溯其源乃是指猶太人自以色列逃亡的「族群散居」狀態，近年則變成泛指移居異國的族群經驗。引威廉·沙凡(William Safran)指出族群散居的幾項特徵，「有離散的歷史、存有祖國的記憶或神話、不被寄居國接受、渴望落葉歸根、持續支持祖國並認同為團體中的一份子。」詳頁 131。威廉·沙凡所談到的特徵和本文所謂「放逐」皆有重疊之處，但置於時代背景來看，則可觀察兩者的差異性。如清代中國和當代全球化的時代差異，抑或是族群(清代滿人、漢人、原住民/當代華人、洋人)議題等等。另外，就「放逐」一詞而言，對照本文第二節開頭引用諸多文獻為對照，則較為符合主題的脈絡。

回溯臺灣歷史，早在明鄭時期前後即是一處具有爭議性和神秘性的空間所在，進而產生出如「瀛洲」、「夷洲」、「流求」、「毗舍耶」與「東番」等繁複的稱謂。除了為海盜或流犯的聚集地之外，諸多清代臺灣方志史料中也詳加記載明末有關鄭氏於臺灣建立「反清復明」基地的遺事，「萬曆間，海寇顏思齊據有臺灣，鄭芝龍附之。尋棄去，荷蘭取其地，因築赤崁城以居。本朝順治初，鄭芝龍子成功叛據廈門。十八年，由海道犯江寧敗歸，逐荷蘭，據之，設郡縣」。³爾後，清廷多次派軍攻打臺灣，「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攻澎湖，克之；鄭克塽降。」⁴康熙二十三年(1684)則正式將臺灣納進中國版圖。但這座遠於皇權控管的海外島嶼，仍不時發生民變，或遭受異族覬覦的威脅。因此，從歷史與地理的元素中，皆能透過文本觀察其「(被)放逐」的性質。⁵本文將以書寫、空間、時間與史詩等命題，探討清代臺灣賦的放逐意識。

二、放逐「意識」的書寫

「放逐」是運用於政治並流傳已久的懲戒手段，早在先秦文獻《尚書·堯典》即有相關記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⁶在上位者平定亂事，將這些異己者流放他處，除了疏離之外，也作為終極的懲罰；《戰國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

³ 詳(清)余文儀(1993)：《續修臺灣府志》，卷一，頁4。引文乃使用1993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版本。

⁴ 同註3。

⁵ 據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中認為清初征台的目的在於「消滅臺灣之抗清復明的勢力，本無領有臺灣之意圖，故施琅攻克臺灣，把鄭氏勢力盡遷大陸，安插於各地之後，就發生遷民棄地之議」，只想保留澎湖作為東南軍事的屏障，但經由施琅力陳其害，始收入版圖。詳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18。

而謝崇耀(2002)，《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關於清初來台宦遊的文人作品特色：「往往都有一種被貶謫而不得志的鬱悶與哀愁，此乃因臺灣地處邊陲，來臺者多有被貶責至天涯海角的感受。」(詳頁39)由此可見，自古以來臺灣即具有被邊緣和疏離化的現象。

⁶ 屈萬里註譯(1969)，《尚書今註今譯》，頁13。屈萬里註解此段文字，認為「流」、「放」、「竄」與「殛」，皆有流放之意。

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⁷《孟子·盡心·上》則說：「伊尹曰：『予不狎夫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⁸《左傳》宣公元年記載：「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⁹到了漢代，史家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¹⁰將屈原〈離騷〉視為放逐文學的典範。另外，《史記·項羽本記》也記載著：「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¹¹魏晉詩人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之十二云：「鵠見城邑，其國有放土」等文獻，¹²則可得知「放逐」這個題材的書寫，已經行之久遠並自成一格。

但是，就上述引證來看，僅只是單純敘事性的表層「現象」。以「意識」(consciousness)為發軔，才是能夠深入此議題的觀念。以《論語·公冶長》孔子曾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¹³為例，已然在一種不被認同的情境，營造出強烈的放逐意識。這樣的「意識」的構成，同時蘊含兩種類型——「被放逐」與「自我放逐」。前面述及部分的文獻，很明顯為「被放逐」；而孔子所言「乘桴浮於海」，則是一種自覺性的「自我放逐」。不過，無論為何種類型的放逐，個體終究面對的是生命去向「云何應住」¹⁴——如何安頓身心於合適的所在。當然，放逐也不單是空間的議題，同時也蘊含著時間問題。尤其，時間和生命的關係緊密，時間量化的多寡，更影響生命價值的彰顯程度。因此，海德格認為人類建立的符號化社會，即是使人能安頓其中的機制；因而，「語言是人生在世(在世存有)的居所」。¹⁵進一步說，「書寫」(writing)出

⁷ (漢)高誘注(1979)，《戰國策》，卷二十一，魏第一，頁 440。

⁸ 楊伯峻(1992)，《孟子譯注》，頁 436。

⁹ 楊伯峻(1991)，《春秋左傳注》，頁 646。下注云：「《說文》：『放，逐也。』杜注：『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¹⁰ 本文收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1987)，《文選》，卷四十一，頁 580。

¹¹ 楊家駱主編(1993)，《新校本史記注并附編二種》，卷七，頁 339。

¹² 邳欽立輯校(1991)，《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十七，頁 1011。

¹³ 楊伯峻(1992)，《論語譯註》，頁 97。

¹⁴ 典出於《金剛經》，詳(明)朱棣集註(1989)，《金剛經集註》，頁 24。

¹⁵ 關於海德格語言與存有的部份論述，可參閱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1990)，《存在與時間》，頁 221-229。

的文本(text)，皆可視為追尋生命意義的產物。海德格舉世界史詩巨作《奧德賽》(Odyssey)為例，此書既能視為一部壯闊的漫遊記，也是透過生命中的放逐(exile)，尋索人生真相的歷程。但不論是放逐或漫遊，潛意識皆是為「歸鄉」而作準備。誠如人類自母體誕生而出，生命即是一場放逐/漫遊。「鄉愁」(nostalgia)是這種宿命式的必然產物，而終止鄉愁(或稱為「歸鄉」)，即是走向死亡。若以抽象的觀點為詮釋，頗類似道家哲學所言「逍遙遊」的境界。

此處，以林謙光的〈臺灣賦〉為例，賦作首先以「汗漫公子」與「廓宇先生」的對談為開頭：

足騁八方、目驚九鄙，訪秦、漢之故都，登雲亭之舊峙。舒神於錢來丹穴之顛，長嘯於渾夕脫扈之址。洞庭、彭蠡，拍驚浪以飈飛；弱水、龍門，鼓輕刃而容與。歷吳越，則翫甲第之連雲；入鄒魯，則羨絃歌之盈耳。¹⁶

對談中，顯現出一幅誇飾意味濃重的地圖。然此一地圖，亦是汗漫公子生命遊歷經驗的展現。不論「秦漢故都」、「洞庭」、「吳越」，還是後來銜接的「神山突出，沃野孤浮。景呈異狀。一崑連七崑而蜒蜿，南崑接北崑而阻修」(《全臺賦》，頁 47)的臺灣山水。這種橫跨疆域(海洋、山脈)景點之間的漫遊，同時也營造出鳥瞰(由上而下)的視覺構圖，進而頗有御風飛行的閒適逸趣。但是，如此盡收美景的漫遊之旅，皆是為某種回歸狀態所作的準備：

不觀滄海者，誇溝壑之弘；不觀王會者，詫都邑之鉅。鄙人乃知今皇帝之輿圖，未易以蠡測也。請為歌以比於雅頌之末。」爰起而系曰：「有土綿綿，有水漣漣。介在絕島，吐霧吹烟。帝赫厥怒，淵淵闢闔。既昭義問，乃命旬宣。崇儒重道，勿棄蒙鰥。匪棘其欲，式廓厥埏。」

¹⁶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2006)，《全臺賦》，頁 46。以下在正文處又引用本書時，僅於引文末標示書名和頁數，不再另行標註。

皇以蒞之，於斯萬年。(《全臺賦》，頁 47)

賦作中所陳述的回歸狀態，並非指涉死亡。而係要透過某種信仰，達到解除生命焦慮的目的。引文中，汗漫先生見識到臺灣壯闊的海景，但卻衍生出行至末路的焦慮感。(即「未易以蠡測」、「介在絕島」)。因此，在放逐歷程中，對於政治認同即成為歸返原鄉之道。「皇以蒞之，於斯萬年」是對於清帝國實施德政的歌頌，也是個人期許以永恆不滅的政治信仰，泯除對於異地的焦慮。

由此可得知，意識是一種「每人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和他的瞬間情況所伴隨的知識」，並且透過此「經驗到他自己的活動，並因此而擁有他自己的經驗」。¹⁷在放逐的過程中，無不展現出個人生命中的變動。同時，透過文學的「隱喻」(metaphor)，闡釋個人的宇宙觀。所以，「放逐意識」，也是透過文字符號的書寫，抒發個人對於生命的感懷。若以鏡子為譬喻，鏡子能夠將物體形象反射出來，那麼，意識的展現，同時也要透過書寫的形式來達成。因而，「物」也是意識構成的媒介。文學場域中的「詠物」書寫，能顯現出此一表達經驗的極致。詠物的創作動機便是由個體意識作為出發點。由「我」所能掌握的物件，為寄託精神與生命存有的指標。於是，透過「物化」理論，作為超越死亡或其它事物焦慮的方式，也是放逐意識展演的面向之一。

觀察清代臺灣賦，亦有不少類似「詠物」文學型態的呈現。這些賦作多以當地山川景物為主題，例如卓肇昌〈臺灣形勝賦〉、〈鼓山賦〉、〈鳳山賦〉；章甫〈臺陽形勝賦〉等。下列，舉張從政〈臺山賦〉為例：

矚崔巍之駢列兮，繫東南之保障。凌滄波而突屼兮，爰作鎮夫臺陽。
脈固發於閩嶠，勢自成其巔峯。蟠蜒蛇蛻，北起雞籠之隈；招遞蟬聯，
南盡馬磯之塘。九十九峯，凌雲霄而聳翠。……時而氣和風暖，極目
晴岡：野花爛熳而獻錦，翠葉葳蕤而散芳。蒼崖懸溜，挂千條之瀑布；
寒谷生春，綴萬朵之紅粧。斯阿映所以不返，而鄭詵於焉停轡。(《全

¹⁷ 項退結編譯(1989)，《西洋哲學辭典》，頁 132。

臺賦》，頁 73-74)

這篇賦呈現出對於山川景物的耽美，作者深刻描寫臺灣山脈的形貌與生物、自然景象，但卻蘊含諸多政治性的觀點——例如「東南之保障」，以及具有特殊意涵的地理觀——「脈固發於閩嶠，勢自成其龍駒」，說明山脈有軍事要塞的功能之外，其本質上和閩地(中國)是同源的。此處，個人的書寫意識已經從一種對於景物的壯遊，延展出政治意味濃厚的意識形態。又例如陳輝的〈臺海賦〉：

輕鷗忘機而翔集，振鷺修儀而來臨。遊戲乎廣淵之浦，棲宿於浮嶼之岑。物色兮生意，徙倚兮行吟。若夫玉宇方澄，冰輪乍徙。石尤斂聲，馮夷屏息。飛白銀兮波光萬里，濯素練兮水天一色。泛輕舠於鏡中，發清歌於舷側。覺宇宙之甚寬，恣遨遊於八極。(《全臺賦》，頁 80)

賦中所描繪的海，展現出祥瑞之氣，而鷗鳥、島嶼、銀色水波等等，皆為同處於宇宙的現象物。尤其，透過輕舟划過如鏡子的海面，更能遨遊世界各處。海被作者想像為一面能夠折射的鏡子，以寄寓文人開闊的胸襟。因此，書寫對於這些文人而言，可說是一種「物」的展現。而詠物的基本原理為詠懷，並且透過詠物而「乘物以遊心」——以書寫來抒拓個人理想與懷抱，建構出自我的存有意識。因為，書寫是「作者銘記自我的空間」，¹⁸同時也夠展現出生命放逐的狀態。作者可以透過寫作漫遊於虛擬的空間，以此肯定自我的存在感。而書寫也必須建構出一種意義性的指標——作者必須與語言進行充分的對話，並建構可觀的意象和深刻的思維。就「放逐」這個文學主題的價值而言，內容除了喟嘆語的描摹之外，其價值也就在於能否駕馭書寫的語言和想像力，並藉由此來觸及生命存有的課題。因此，在臺灣賦的放逐意識中，除了以時代背景與美學為切入點外，「假於異物，託於同體」亦為探析清代

¹⁸ 簡政珍，〈放逐詩學——臺灣放逐文學初探〉，《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六期，1991年11月，頁4-24。

臺灣賦的原型之一，¹⁹也是作為書寫者放逐意識的表述型態。

三、放逐空間的雙重建構

提及「放逐」，則不能忽視「空間」(space)議題。廖炳惠在〈放逐與政治〉中認為放逐書寫的產生，即在於「敘述心靈因地理隔絕、認同頓挫而產生的種種變化。」²⁰因此，可以得知在放逐的行為中，「空間」為其構成的必然元素。書寫者從一個政治、道統與社會文化建構的核心場域，(被迫)遷徙至邊緣地帶的過程，即是一種空間運動的實踐。同時，將之訴諸作品，則能夠解讀出書寫者意識的組合與構成。因而，空間能夠作為現實世界的實體投射，也可以作為一處充斥著虛構與理想世界的連結。²¹

清代臺灣賦中的空間建構，部分即和前文說過的「自我放逐」有關。多數學者認為先秦屈原是此類自我放逐的典型代表，²²並能將之視為「帶有自譴性的政治行為」。²³而此一行為，多數容易和中國歷代的「隱逸」文化產生重疊，這兩者「肯定山水田園足以娛情悅志，對清幽靜謐、平淡自然的素樸生活有一份嚮往，於是選擇逍遙泉石、放情肆志、飄逸不羈的生活情態，以

¹⁹ 「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典出於《莊子·大宗師》，詳(清)郭慶藩(1983)，《莊子集釋》，頁268。

²⁰ 廖炳惠，〈放逐與政治〉，《聯合文學》，第七卷第三期，1991年1月，頁35。

²¹ 廖炳惠編著(2003)，《關鍵詞200》，頁247-248。本書提及的「空間」，係以社會學來進行詮釋，譬如空間的管理和被管理、空間的實踐與再生產。以及，呈現人在空間中的凝視/被凝視的政治議題。因此，空間是社會生活的投射，同時也能夠作為一種隱喻。

²² 廖美玉，〈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自我放逐意識——由幾首「佳人」詩談起〉一文認為：「放逐或稱流放，適用於政治結構中的上層階級，是『由權力機構強制某人長期離開本國的一種懲罰手段』，在古代的希臘、羅馬與中國，都曾經出現過。……比較特殊的是屈原，在傳為屈原所作的《漁父》一文中，漁父在勸屈原與世推移之後，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強調屈原的放逐是自找的，可以避免而不避免。」《成大中文學報》，第一卷，1991年11月，頁211。

²³ 同註22。

一分偏狹的自足之樂，棄絕了個人對現實的認同。」²⁴雖然，此處無法直接斷定「放逐」和「隱逸」兩者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兩者對於當下存有空間的書寫，皆對自然山水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自我放逐是士人甘願以受苦的形象，堅持自我理念的貫澈，進而企圖激起世人的反省，他們對於已然淪落的世俗終究是不肯放棄的，他們對於放逐後的苦難困窘更是了然於胸並且一肩承擔。」²⁵

以空間為題材的文學書寫，除了舉目所見地風景如實映照於文本內，創作者「凝視」和「書寫」的空間，也構成個體生命隱喻的載體。清代臺灣賦中，空間的營造有部分既是理想世界的投射，也是文人精神上(肉體)苦難的源頭。

(一) 理想世界的投射

古典文學中馳名的理想世界，莫如魏晉時代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中的「桃花源」。陶淵明為隱逸詩人的代表，〈飲酒詩〉為個人幽居鄉野超然自適的代表作，〈桃花源記〉則是此一情懷的至高境界。原則上，這個境界是建立於對生命所「嚮往的落空」。

根據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所言：「此『嚮往』相夾『放逐』感與『匱缺』感俱來，而且其中『放逐』至少有五重」。²⁶五重層次如下：第一層為過去的、領土的(territorial)放逐，第二層的放逐感來自時代的差異：「問今世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第三層的放逐則是由記號語言產生。²⁷而第四和第五層的放逐，則是建立在

²⁴ 同註 22。

²⁵ 同註 22。

²⁶ 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中外文學》，第 10 卷第 10 期，1982 年 3 月，頁 135-136。

²⁷ 漁人在「既出」之後，仍駕船沿原路走，然而卻起分別心，有意再訪桃花源，因此「處處誌之」，並到那裏詣見太守「說如此」，這記號與語言的造作，都與當初「忘路之遠近」的心態截然不同，因此無法重新返回。詳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頁 141。

創造和讀者閱讀的感知過程，和本論文無直接關係。而從第一到第三層的放逐，其實較和放逐的書寫相關，已涉及空間、差異性與文本建構的議題。此處，可以得知放逐是建立在生命的匱缺感之上。因此，作品便成為填補此種感知的寄託。於是，建構理想的空間，即是書寫者面對的課題。

觀察清代臺灣賦，確實存在類似於「桃花源」空間的語彙，如周于仁〈觀海賦〉：「崎嶇歷盡，乃至桃源」（《全臺賦》，頁 67）。或者，有關神話性質的地理想像，例如卓肇昌〈三山賦〉中，則將中國的仙島傳說，悉數移植進文本：

四極奠麗，三山屹呈。飄飄方丈，渺渺蓬瀛。流弱水而無根，隨波上下；命巨鰐而負載，鎮峙崢嶸。別島藐乎拳石，仙居敞乎飛瓊。龍縱上通帝座，彷彿直接瑤京…玉華金液，尋縹渺于露臺。神禹鑿龍門，步經章亥；漢武臨渤海，幾至蓬萊。（《全臺賦》，頁 107-108）

賦作中描繪的「三山」，指涉的並非全為山岳，而係傳說中的海上仙島。「流弱水而無根，隨波上下」是海中島嶼的存在形貌；「崢嶸」等形容修飾的詞彙，則是種視覺上的遠觀經驗所構成的圖景。而文中所言的「方丈」、「蓬瀛」或「蓬萊」，皆為臺灣島的象徵。

卓肇昌又將由遠而近的視覺景框，推移(由外而內)至特定的場景空間：

別有翠羽文禽、奇岑怪島；闊苑交梨、安期火棗。臨安隱芝、姑射瑤草。千年雪藕，西母筵開；萬歲冰桃，東方偷早。移石蘚仍斑，種松鱗未老。雲中雞犬，金華山上皆真；夢裏蝌蚪，石室藏中誌寶。若乃登奇巘、踞幽巒，崑崙獻媚，積石弄陰。（《全臺賦》，頁 108）

上述引文，如「西母」、「姑射」與「冰桃」皆是神話符號的展現，近而將臺灣地理的在地性全然遮蔽。由此可知，卓肇昌建構出的理想空間，是有所依據的——乃和中國遠古的神話系統產生對話與連結。神話是一種「以寓意著

超越境界的臨現、并道出莊嚴深奧的訊息」之物，²⁸〈三山賦〉是企圖透過超越現實世界的建構，寄託文末所言的「民物康阜」與「家室盈寧」的美好理想。當然，這也和清朝政府統馭臺灣的道統意識有關。相似的例證，亦有高拱乾的〈臺灣賦〉：

乃至蝦鬚百丈，鰐骨千尋。貝文似鳳，魚首如人。大龜之壽三萬歲，蝴蝶之重八十觔。非此邦之物產，蓋在乎南海之濱。又如蜃樓縹渺，海市高低。碧雲擁日，滄海爲梯。光從定後，圓始天躋。非此邦之風景，又在乎東海之青、齊。更或橋邊鼈泣，別淚如珠。(《全臺賦》，頁 53)

同爲具有神話空間的營造，但高拱乾很明顯地將焦點置於海洋，特別是將許多水族生物，賦予神怪的特質。如「蝦鬚百丈」、「魚首如人」，以及，清代臺灣方志紀錄中被神話化的「鰐」。²⁹此種神話空間的營造，非常貼近臺灣海洋的地理特質。但是，高拱乾並非以神話來建構出一個和平的理想空間，而是透過這種和現實區隔/疏離/不存在的「虛構空間」，理解眼中這個「水土無情」、「險上險」的宦遊之地。

而高拱乾〈臺灣賦〉中，卻也浮現一個地理方位的命題——「南方」。回到前述的「桃花源」空間，有關桃花源的正確方位眾說紛紜，一說是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但也有學者以從民俗文學(folklore)流傳及接受(reception)的角度，推論出「桃花源」即在中國的南方。³⁰若以空間地圖的角度來看，臺

²⁸ 關永中(1997)，《神話與時間》，頁 15。

²⁹ 「鰐」，即是今日所謂的「鯨魚」。據(清)謝金鑾(1993)，《續修臺灣縣志》：「海翁，海鰐也。」(頁 56)又(清)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海翁即海鰐。大能吞舟，黑如牛。背浮於水面，則大風將作。」(頁 120)從清代臺灣方志中可以看出此類生物被賦予預示災異的形象。

³⁰ 同註 26，頁 137。廖炳惠在〈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文中引學者陳寅恪的觀點認為「傳說晉、宋之間流行於荊湘，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了『桃花源記』。」

灣確實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的海域，也存有許多神話傳說。如張從政的〈臺山賦〉：

大岡側臥，疑仙人之尸解；半屏中斷，似巨靈之手擘。登龜山兮一瞥，顧風景兮四徹。挹群峯之秀整，喜地靈而人傑。此南方之形勝，洵昭然其可揭。（《全臺賦》，頁 73）

雖然係以描寫臺灣的山脈為主，卻鋪上濃厚的神話色彩。尤其，因為位於南方的地理關係，使山川形勝皆帶有引人入勝的靈氣。如此的空間建構，誠如本篇文末所言「爲海東之砥柱兮，亘萬古而永峙」，乃是存在著一種對於時間的想像——「永恆」。透過這個地靈而人傑之處，解銷萬物走向形滅的宿命。此一空間的延展，其背後存在是個體對於宇宙的沉思，亦有當時社會環境濃重的政治色彩。

林謙光〈臺灣賦〉，則更能展示這種帶有治理慾望的空間之頌揚：

厥地惟鹵，厥土惟墳，厥田惟土，厥種惟糜，厥草惟茂，厥木惟囷，厥珍惟錯，厥布惟芬，厥鳥惟鵠，厥獸惟群。飛潛動植，長盛紛紜。嘉茲壤之沃饒，矧溫風之時至。犬吠雪以爲常，龍興雲而不睞。却溽暑於竹柳，掃嵐烟於蘿薜。刺桐飄經歲之絳霞，菡萏盈四季之夏氣。…則有文身番族，黑齒裔蠻：爛滿頭之花草，拖塞耳之木環。披短衣而抽藤作帶，蒙鳥羽而編貝爲繫。聞中國異人之戾止，乃跳石越澗以來觀。（《全臺賦》，頁 48）

種類繁多的異獸、茂密的草木與四季溫暖的氣候，構築出理想空間物產豐饒與和諧的樣貌。尤其，有關臺灣原住民（「文身番族」）的服飾和行為（「聞中國異人之戾止，乃跳石越澗以來觀」）的書寫，更貼近桃花源「化外之境」的想像情境。這也確實符合放逐書寫中，個體在遠離故土後將個人理想寄託於

一處「烏托邦」(Utopia)的寫作模式。³¹只是，清代臺灣賦中，這種空間建構，書寫者個體卻是依附於龐大的帝國體系之內，間接成為政治勢力的空間/意識延展的工具。

(二) 孤立與隔絕

關於放逐意識中的空間建構，除了借物詠懷的理想世界之外，亦不能忽略此空間背後所蘊含的問題——生命的匱缺感。從上述中，可以看到理想世界是虛構的而不存在於現實的想像體，尤其，賦作的理想空間，存在著一種幽閉隔絕的意象。

這種孤立而阻絕於外的意象，即是和臺灣現實的地理空間有關。從外在觀察而言，臺灣本就是獨立於外海的島嶼。清代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有記載：「臺處閩東南嶼，地勢最下，四面環海，遙隔重洋，其氣候與內郡縣殊，大約暑多於寒。」³²就外在空間而言，臺灣島沒有和中國銜接，連帶氣候也同樣具有差異性。李欽文〈紅毛城賦〉有言：

繫臺灣之荒裔，實海國之神區。地屬東南之極，星分牛女之墟。當洪濛之未啓，恣鹿豕之所如。(《全臺賦》，頁 61)

李欽文言明臺灣位處於中國東南方位，為某種「極端」的展現。不過，此處的「極端」，並非實指頂點/頂端，乃係形容對望/對立的關係。就如同銜接而下的「星宿」——以星宿(牛郎織女星)作為臺灣/中國兩地分隔的比擬，³³陳

³¹ 侯作珍認為這種空間建構，是建立於放逐的嚴格定義：「個體在被迫的狀況下遠離故土，形成對故土和祖國政權的批判和抵抗，並將個人理想寄託於另一處烏托邦，…」詳侯作珍，〈臺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〇到八〇年代為探討中心〉，《文學新鑑》第六期，2007 年 12 月，頁 28。但回顧清代的臺灣賦，因為時代關係和創作者的身分背景，並無明顯的抵抗與批判，多的是對於祖國的認同。

³² (清)王必昌(1993)，《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二，頁 395。

³³ 關於「星分牛女之墟」，乃係《周官》以降用於「疆域分野」的方法學——即以星宿的方位，劃分土地的分界。關於閩臺的牛女之分，可參(清)高拱乾編纂的《臺灣府志》等其它清代方

述臺灣「洪濛之未啓」未有文明開化的蠻荒狀態。

此處，再對照王必昌〈臺灣賦〉中關於海的描述：

顧其地時震，而海常吼。論者僉曰驚濤之溢湧，幾視斯壤若等於浮漚。

不知地廣而厚，海深而幽。(《全臺賦》，頁 86)

海浪和地震彷彿有因果關係的存在(因震動而吼)。除了將海浪賦予聲音的想像連結，進而也描寫到島嶼漂浮(於浪濤)的意象，以及，「深度」的觀測。張渭〈海吼賦〉，也如出一轍：

環臺皆海也。自夏徂秋，颶風屢作。驚濤溢涌，雷吶電焯。擊於鯢身，厥聲迴薄。遠近相聞，莫不錯愕。…轆轤四起，蕩潏八垠。冰崖崩裂，鐵騎群奔。縱金鏞於山谷，擺雷琅於乾坤。其爲駭也。龜鼈駁遷，鼉蜃連屯。天吳奮以叫號，罔像詭以遊巡。鬥饑蛟而水立，哮鼯虎而林昏。於是經旬陰曠，徹夜喧豗。(《全臺賦》，頁 76)

〈海吼賦〉的主題顧名思義聚焦於「海」，四面環海的自然空間，成為來臺宦遊文人的創作題材。張渭使用諸多生動的譬喻，將海洋營造出一個多面而立體的空間。在美學的想像之中，卻也蘊含個人不可言喻的哀愁：

則有域外孤臣、天涯羈客，…。悵落葉於始波，感吟蟲於將夕。愁泛宅之杳茫，憶弄潮之夙昔。徒撫影而徘徊，或隨聲而嘆喟。(《全臺賦》，頁 76)

志中的「星野志」。在清代臺灣賦中，例證尚有卓肇昌〈臺灣形勝賦〉：「郡號臺灣，古傳昆舍。星分牛、斗之墟，地當閩、越之跨。」亦有林夢麟〈臺灣形勝賦〉：「在水一方，在地蘊藉。域處東南之濱，星分牛女之舍。」兩篇賦作分別見於許俊雅、吳福助主編(2006)的《全臺賦》頁 97 和頁 114。

書寫者徘徊於岸邊，猶如被放逐的孤臣，內心正承受著因思鄉所產生的孤寂感。因此，此處可以解讀放逐書寫的思維，正是藉由自然山水建構出對於意義的探索。因此，可以看出海洋是作為地理阻隔的指涉，也成為個人生命與感知的對象物。

周于仁的〈觀海賦〉，同樣也藉著外在事物延展內在意識的層次，以提升空間書寫的內涵：

非山而浪擁千峰，無花而波開萬朵。不雨而風激如霖，搖星而眼迷似火。時起霧而騰烟，間推垠而列堦。正子午於星經，防風颶之相左。中有二溝，尤稱奇特。紅溝兮如丹，黑溝兮似墨。形稍竚而不平，勢橫流而若仄。(《全臺賦》，頁 67)

運用諸多意象和修辭，描摹臺灣海域浪濤洶湧和潮流交會的自然現象。同時，也觸動作者內心複雜的情緒：

窮睇眄於汪洋，覺疇昔之言海，不啻乎管窺而蠡測。炯炯然合五十載之睹記傳聞，不覺於斯而有得。嗟嗟！觀屬於目，理通於心。量可有容兮，吾觀其大；虛乃能受兮，吾觀其深。觀豈徒然哉？擴所觀以服政兮，又何難當明聖之世，而堯舜乎斯民？獨鄙人識闇而才疎兮，愧有志而未能。(《全臺賦》，頁 67-68)

從〈觀海賦〉中，可以得知周于仁五十餘年的宦經歷，即為一部龐雜的遷徙史。而臺灣卻是作者宦遊過程中離家鄉最遙遠的地理位置。雖然處於「明聖之世」，但位處於四處為海所孤立的空間，開始質疑自己「有志而未能」，而延伸出一股屢遭放逐的感慨。

承前所述，海洋是個存有負面寓意的空間，周澎的〈平南賦〉中談到：「惟是東南一代，溟渤奧區，蛟鯨出沒，陸梁逋誅。依鼈鼈以窟宅，聚蜃蛤而為徒。」(《全臺賦》，頁 56)「蛟鯨」和「蜃蛤」為惡勢力的象徵，直指

臺灣本島和海域除了在自然環境險惡外，也是個海盜亂民的聚集地，進而烘托出〈平南賦〉渡海討逆的主旨。此處，再以高拱乾《臺灣府志》(1696)的海洋觀為參照：「若夫風有氣而無質，南風柔弱、北風剛勁，各有所尚。故颶風不作，則海不揚波；撫安流之襟帶，而知中國有聖人焉！」³⁴在政治層面中，「風行草偃」的「風」作為教化寓意的象徵；高拱乾將之和自然生態為結合，延展為助長(「颶風」)巨浪的惡勢力催化劑。這個惡勢力便係以海洋為載體，進行範圍的擴張；如何能建立一個和諧的局面，則和周澎〈平南賦〉的觀點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放逐是種政治上的懲戒，乃是以空間作為疏離異己者的手段。以清代臺灣賦為觀察，這種現象是現實舉目所見的對應，使書寫者衍生出對於生命的匱缺感。但是，這種現象卻存有雙重性的解讀——文人直接陳述負面特質的空間，而部分也透過想像與轉化，建構出能使之圓融的理想世界。

四、時間：史詩與懷思

在論述生命意義時，「時間」(time)是非常重要的觀察點。個體之間因為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對於生命的詮釋也就產生各種差異。在探討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書寫，「時間」的詮釋亦為論述的主軸。同時，也和作者的「歷史」(history)想像有所關聯。

(一) 存有：時間的意圖

據海德格言，時間乃係一種存有物(being)的持續(duration)，無存有者即無所謂持續。³⁵而不斷滅的存有者(immortal Being)則可以持續運行，即是所謂的「永恆」(immortality)；而會斷滅的存有者(mortal being)之持續樣態，即是稱之為「時間」。時間有先後順序的持續，即涵括「過去」、「現在」與「未

³⁴ (清)高拱乾(1993)，《臺灣府志》，卷七，頁185。

³⁵ 同註15，頁445-463，探討時間的存在與其相關意義。

來」三個面向。過去者，是不存在於當下(現在)，但卻是存在於客體效果和主體記憶之內。現在者，就數學意義而言，呈現出時間的不可分割性。簡而言之，就是所謂「剎那」(等同於「現在」)。未來者，是「期待」中，但尚未發生的事物與事件。

引王必昌的〈臺灣賦〉為例：「載考番俗，約略可紀。罔識歲時，弗知甲子。以月圓為一月，以稻稔為一祀。」(《全臺賦》，頁 86)清代臺灣賦中有許多關於臺灣原住民(番人)的風俗考察，此處，展現一個民族時間的觀察紀錄。所謂「罔識歲時，弗知甲子」，可得知番人並沒有確切的時間觀念。但是，要如何證明其生命的「存有」和「持續」呢？自然景物(月圓、稻稔)即為計量時間替代著準則。當然，文本中時間的書寫，亦有其意圖的存在。王必昌〈臺灣賦〉展現出某種「異國情調」(exoticism)的想像之外，也突顯出時間觀念中「有」和「無」的對比。王必昌〈臺灣賦〉接著提出：「久道化成，百昌咸遂。」(《全臺賦》，頁 87)滿清皇朝為體系運作的核心，其掌握的涵括「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的三種詮釋。「久道化成，百昌咸遂」其意圖明顯展示出對於未來時間的期許——透過教化使這個放逐之地，達到政治穩固的目標。同時，清代臺灣賦也提出海德格所言另一個時間命題：「永恆」。林謙光〈臺灣賦〉：「皇以蒞之，於斯萬年」(《全臺賦》，頁 49)即是呼應此一時間意圖的例證。對於人類的存有、生命的存續而言，「永恆不滅」是不可能實踐的現象，而只能將之視為一種想像的時間類型，或是一種信仰上的期許。

再者，有關「時間」的命題有所謂「物理時間」(physical time)和「想像時間」(imaginary time)兩者的區隔。物理時間乃指稱每個人、事、物固有具體的持續，較接近人類社會的範圍。以清代臺灣賦為觀察，時間也可視為被凝視的靜止狀態，誠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張以客觀化的(objectified)運動為思考時間之基準，並主張其具有一個優位性(priority)的存在。伽利略(Galileo)與牛頓(Newton)也承認亞里斯多德這種觀念，並間接提出「空間」命題。首先，先採用逆向思考為詮釋方式，否定時間的絕對靜態，同時便無

法賦予意義(或事件)於空間中的絕對位置(即絕對空間)。³⁶乍看之下，時間和空間是可被切割的，但是，果真如此？事實上，這種觀念只能夠運用於相當緩慢的「旅行」而已。³⁷「相對論」的出現，則鬆動這個「絕對時間」的觀念。假設每人攜帶鐘錶來計算時間，彼此之間的行為便不再被要求一致。³⁸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身體，同為空間的示現，也是時間計量下的產物。兩者，並非能夠全然分割的，於人類，乃至整個宇宙萬物，皆為「空間/時間」組合而成的客體(object)。

如王必昌〈澎湖賦〉：「滄溟萬里，極浩淼以無垠。灑浪花之崖石，含天影於岫雲。」(《全臺賦》，頁 88)將視覺內無際的海岸景觀，置入時間的象徵：「至若嘉名異象，盡態極妍。幾千萬年而永在」(《全臺賦》，頁 89)堅固的島嶼，永不枯竭的海，涵攝時間與空間於宇宙道體內的運行。但是，就現實而言，這只是對於「物」進行外觀的描繪，旨在呈現時間積累的「狀態」而已。另外，這種乍似於永恆不滅的狀態，是借取物理時間的概念，將之衍異為誇飾或想像的修辭之用。另外，周于仁的〈觀海賦〉，則展現出時間/空間合體的同步情形：

憶余春秋五十有五，謁選屆期，再治我輔。熟路兮輕車，越山兮度浦。及銓授永春，庭對聖主，三觀天顏，感興欲舞。銜命就道，幽、燕、齊、魯。…甫越其年，胡又量遷？澎湖重地，海島孤懸。捧檄遄征，再歷興、泉。廈門暫憩，詹吉登船。…窮睇眄於汪洋，覺疇昔之言海，不啻乎管窺而蠡測。炯炯然合五十載之睹記傳聞，不覺於斯而有得。…獨鄙人識闇而才疎兮，愧有志而未能。(《全臺賦》，頁 67)

書寫者身體除了隨著空間移動之外，同兼具有「計時器」的功能。時間和空

³⁶ Stephen W. Hawking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Books, pp.17-18.

³⁷ 同註 36, pp.18-19.

³⁸ 同註 36, pp.20-22.

間，兩者互相作為書寫者周于仁生命存有的見證。時間和空間的合體，展現的是周于仁由中國內陸至澎湖海域的宦遊歷程。島嶼是個體生命史中某個點，他認為能親身目睹海濤的氣勢，理當有所自得。不過，卻有感而發地叩問自我能力的極限。

(二) 史詩：時間之思/詩

從時間意義的探討中，可以理解時間的存在，乃為啟發生命存有與意義的媒介。以清代臺灣賦為觀察，也延伸出史詩意象(epic image)的書寫與重構。同時，史詩意象在臺灣賦中亦作為一個貫串創作核心的主流意象。「史詩」是歷史事件的再現，與民族精神的展現，也為放逐意識中「懷思」(nostalgia)的構成之命題。

何謂「史詩」？Paul Merchant《論史詩》曾言：「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現實有關——清晰地強調了它最重要的原始功用中的兩個。它是一部編年史，一本『部落之書』，一部有關風俗與傳統的重要紀錄，而同時也是一本供大家娛樂的故事書。」³⁹在希臘哲學中，史詩的本義是「言」(Wort)和「傳說」(Sage)。而黑格爾(Hegel)認為史詩是民族英雄精神的實踐。反觀中國有「詠史詩」，但若僅以「詩」作為觀看題材未免過於局限。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卻是可作為管窺史詩奧義的對象，民初學者魯迅曾將之譽為「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⁴⁰尤其，〈太史公自序〉中則含有諸多史詩的命題，簡而言之，就是「本紀」、「表」、「書」、「世家」與「列傳」這五個體例中，攸關歷史存有與意義的探討。能夠貫串這五組命題的脈絡，即〈太史公自序〉：「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⁴¹呈現出帝國由盛而衰(由衰轉盛)演化的歷史論述。

所以，此論述乃是以帝王為核心，表述帝國的興衰始終，即是對於民族

³⁹ 保羅·繆遷(Paul Merchant)著，蔡進松譯(1973)，《論史詩》，頁4。

⁴⁰ 魯迅(1991)，〈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九卷，頁420。

⁴¹ 楊家駱主編(1993)，《新校本史記注并附編二種》，卷一百三十，頁3319。

繁衍的教誨。因此，帝王(乃至整個帝國)便是時間度量的依據，其論述要義即擺放於建國至亡國的歷程，以及其間的演化因果。當然，史詩也是個具有集體性的產物，而這種集體性乃係由宗教意識與現實世界的存有結合。宗教意識源自人類精神深層，和現實具體的此世根植於政治生活與家居生活。(Hegel, 330)以王必昌〈臺灣賦〉為例：

方今風會宏啓，聖治廣被。久道化成，百昌咸遂。海不揚波，地奠其位。馬圖器車，物華呈瑞，人傑應運而齊出矣。(《全臺賦》，頁 86-87)

文中的「物華」為此一世界的存有物，而「應運」則是此「物」所延伸的宗教意識。帝王自古以來即是被神格化的主體，而擴展帝國版圖和政治作為，皆有宗教意義的實踐。〈臺灣賦〉中的臺灣風土，卻透過了滿清大一統政權的延伸，頓時被賦予政治/宗教的意涵。同時，這種史詩的思維，也由此層層推展至生命個體之間(即「表」、「書」、「世家」與「列傳」)，洞燭「時間」與召喚「歷史」的真諦。

觀察清代臺灣賦，不乏召喚歷史與辯證時間的史詩書寫。如李欽文〈紅毛城賦〉與〈赤嵌城賦〉、卓肇昌〈臺灣形勝賦〉與〈鼓山賦〉、林夢麟〈臺灣形勝賦〉，以及清末楊浚兩篇〈澎湖弔古賦〉等。王必昌〈臺灣賦〉則是此史詩書寫之集大成：

溯夫天造草昧，遐裔荒墟。南北土酋，穴處巢居。迨有明之宣德，遣中官以乘桴。遭風偶泊，始識其途。嗣是以後，狡焉啓疆，實繁有徒。曾一本竊據於澎島，林道乾勾致夫倭奴。繼以思齊之嘯聚，荷蘭之詭圖。洎乎鄭氏，乃凌險而負嵎。建偽官，開方鎮，萃濱海之逃遁。因利乘便，順風長驅。陷七郡，破潮、粵，犯溫、臺，掠東吳。毒燄所觸，沿海焦枯。熊蹲四世，虎視方隅。(《全臺賦》，頁 83)

引文陳述臺灣歷史的發展，十分具有條理和層次。就歷史正朔而言，也呈現

三個朝代的時間容器——「荷蘭」、「明鄭」與作者身處的「滿清」。當然，也包含流竄於東南的盜匪曾一本、林道乾和顏思齊等足以和帝國抗衡的地方勢力。賦中呈現的史詩書寫，也符應了上述一個時間意識的構成——「時間/空間」的合體，亦可稱作「時空合一」。當兩者在特定的點交錯(共同標定)之際，即可將之界定為「事件」(event)。就物理學的觀點來看，可以用四個數碼或座標圖來標示之。⁴²王必昌〈臺灣賦〉中呈現的，即是這種時空交錯所產生的「事件」。這一組組的事件，構成清代臺灣賦中史詩書寫的元素，同時也能作為觀看作者意識的媒材。雖然，王必昌的視角也向前追溯至荷蘭殖民前的「南北土酋」的蠻荒時期，不過，史詩的主題仍聚焦於前朝——明鄭王朝統治臺灣的過程。類似情形，也出現於高拱乾的〈臺灣賦〉：

一自地借牛皮，謀成鬼伎。斷髮裸身，雕題黑齒。營赤崁之孤城，築安平之堅壘。隱樓櫓於鯤身，藏火攻於鹿耳。貿易徧於三洲，資生憑乎一水。藉三保而標名兮，致懷一以不軌。哀商賈之何辜兮，聚魂魄於蒿里。嗣是荷蘭煽虐，天贊成功。鹿門潮漲，渝窟戌空。時移事去，兵盡矢窮。竄餘生而歸國兮，遂此地為蛟宮。非天心之助逆兮，蓋刦運之未終。(《全臺賦》，頁 51)

引文明顯地寫出荷蘭統治的臺灣景況，以及與明鄭銜接的始末。高拱乾的觀點認為，鄭成功從異族手裡收復臺灣土地的主權，多是(僥倖)借助於神力，才能得以完成。所以，高拱乾召喚歷史的真諦，其意圖乃是展現個人的時間觀——「時移事去，兵盡矢窮」。雖然，改朝換代為宇宙的自然規律，但是，處於明鄭管理下的臺灣，猶是處於等待救贖的劫難之中。

海德格曾言「純正史詩的特徵是以個體化形式存在的具體的精神。」所以，史詩所要表達的是說出意識在此世間所有的關係與經歷裡，與意識客觀對立的客體對象全豹。因此，史詩也必須要有豐富的情節啓人省思。而這個情節則是建立於一個民族或時代的世界觀之上。對照高拱乾〈臺灣賦〉，其

⁴² 同註 36, pp.24.

意圖就在歷史更迭的敘事中，建構一個服膺當下情境的民族觀：

咨左右之夔龍，率東南之熊虎。定百計以安瀾兮，果一戰而納土。于焉擴四千載之洪濛，建億萬年之都邑。風既變爲新裁，俗亦除其舊習。文武和衷，干戈載戢。誰肆志以行吟，豈有懷而靡及。若夫汪灊既倒，海若呈奇。一時琥珀，萬頃琉璃。情渺渺孤往，天青青兮四垂。風輕兮水面，雲淡兮山眉。即孤臣與孽子，亦撫掌而忘饑。(《全臺賦》，頁 51-54)

發動戰爭討逆是順應天意，同時也是鞏固王權的必要手段。透過此才能爲臺灣革除舊習開展新未來；也是透過這場聖戰才能宣揚教化，使得這多次被歷史更迭所放逐之地中的「孤臣與孽子」，獲得生命的安然。

回到時間意識的脈絡來看，「相對論」的出現消除了絕對時間的迷思(myth)。⁴³同時，也肯定每個人能夠擁有私人的時間度量。⁴⁴從清代臺灣賦中可以看出，書寫者皆有個人對於時間的定義，以及對於歷史的解讀。此處，再以明末沈光文〈臺灣賦〉爲例，⁴⁵賦中前稱「滿奴」，後曰「天朝」，儼然奉明朝爲正統，表現出時間意識的相對性：

天念民瘼，淪身溟海；地隨氣轉，假手延平。此固天時之將漸移而善也，乃俾鄭氏之先爲開其端耳。…永曆十五年辛丑四月朔，鄭延平奮命臺灣，民番懼伏；荷蘭人終棄鯤身，上下悚惶。雕題黑齒之人，跳梁豈敢；鏽耳文身之輩，蠢動無聞。嶺後嶺前，閭閻接地；舊渡新渡，舸艦聯雲。彼海澨之風雖殊，而性善之理則一。承天爲舊設之府，東寧乃新建之名。(《全臺賦》，頁 529-530)

⁴³ 同註 36, pp.35.

⁴⁴ 同註 36, pp.36.

⁴⁵ 此篇賦作收於《全臺賦》的附錄，學者盛成透過考證所還原的「擬作」——將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和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刊載沈光文〈平臺灣序〉，考證還原中沈光文原著的〈臺灣賦〉面貌。雖說爲擬作，但仍具有參考的價值。

由此，可以看出改朝換代的人事變革，正可突顯出時空觀的相對性與差異性。透過史詩的書寫，沈光文展現個人所託喻的政治氣節。對照清初高拱乾等人的史詩解構，南明遺事則是一個詮釋分歧的「計時器」(horologe)。在這個計時器中，假若臺灣構成一種主體性的言說，則為高拱乾或其他賦家所不認同的。因而，時移事轉，臺灣的時間主體與歷史書寫，則必然臣服於滿清政府的體系之內。

「計時器」是一個單位，也是人類對於時間的詮釋，其材質與形式則決定時間的度量與定義(definition)。霍金(Stephen W. Hawking)的《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則發現探討計時方法中循環論證的弔詭。⁴⁶如果能以理性尋找到一個完全整合理論(complete unified theory)，則此一完全整合理論(如果真正具有完全整合理論的力量)必將完全整合我們的推理與結論。霍金(Stephen W. Hawking)採用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抉擇原理(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解消上述循環論證造成的困局。達爾文的原理認為，任何自我再生的物種裡，都有遺傳與生養上的個別變異。因此，證明有些個體對世界作出了正確的結論，而更適宜存活。人性最深的求知慾使我們持續追詢並獲得正當性。基於達爾文的自然抉擇原理(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有些個體對世界作出正確結論，因而更適宜存活。是故，我們追尋完全整合理論的目的，乃是對於自身生存的宇宙，作出完整陳述的欲望。

此種陳述的慾望，在清代臺灣賦中，則實踐於史詩之內道統意識的建構。因而，將之置於放逐意識中的脈絡來談，則必然可以發現一種「懷思」情境的存在——簡而言之就是「回歸」。書寫者所言的回歸，或許是個實體的空間(例如家、宗主國)。從諸多賦家身分為觀察，並非全然出身於臺灣當地，如高拱乾、周于仁或張渭多是以宦遊身份來臺於。因而，作品皆有寄寓鄉愁的情形產生。上述的「回歸」若對應於「史詩」觀念之中，則係呈現出一種對於文化信仰/鄉愁或政權體系的呼喚。王必昌的〈臺灣賦〉中認為，唯

⁴⁶ 同註 36, pp.13-14.

有呼應清朝這個政權體系，這塊自古被視為放逐惡地的所在才能逆發生機，構築出存有的意義：

維我仁廟，皇靈震疊。命將專征，克撫讐帽。遂按圖而設版，復定賦而計甲。闢四千載之方輿，安億萬姓於畚鍤。慶文教之誕敷，群入學而鼓篋。或挽車而騎牛，或操舟而理楫。重洋問渡，舸艦帆聯。樂土興歌，人民踵接。蓋茲邦之廣衍，兼四省而延袤。作南服之藩籬，挺一方之奇秀。（《全臺賦》，頁 83）

過往的歷史經驗，可以給予個人作為生命的借鑑；而對照臺灣賦，歷史的啓發便是呈現出馴化的思維——唯有接受清廷的統馭，才能建構安樂的盛世圖景；此處，也能看出清初文人對於政治信仰上的瞻仰孺幕。跨海聖戰是皇威的展現而納入版圖則是回歸中國的最終實踐之道。在清代臺灣賦中，這是「文化鄉愁」(cultural nostalgia)的一種衍義，也是放逐意識中必然呈現的模式。誠如王必昌〈臺灣賦〉所言「感物類而躊躇，忽愴懷於逆旅」（《全臺賦》，頁 84），透過歷史的言說與詮釋，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機制所認同。

五、結論

放逐，為文學創作中一個重要的母題。從寫作觀點而言，任何的文本皆為放逐的產物，透過虛實交錯的形式，建構出一個提供自我漫遊的空間。本文探討清代臺灣賦的「放逐意識」，首先以「書寫」為探討，結合放逐與形上學等觀點，與空間和時間等議題產生多重對話。

從放逐意識的角度觀察清代臺灣賦中的空間建構，可以看出賦作仍承襲先秦南方《楚辭》以降的書寫模式。尤其，多有奇花異草或珍禽異獸的描寫，還有一個虛實交錯的理想空間的營造，使得臺灣賦浸染著神話的氛圍。這種類似「桃花源」的地理想像，實也呼應古代文人喜藉詠賦山水為個人安身立命的隱喻現象有關。但是，賦中塑造的「臺灣」既是美好理想的象徵，也是

歷史發展中聚集罪惡的所在。清代臺灣賦中的海洋和島嶼書寫，多為此空間特質的呈現。以空間為題材的文學書寫，除了舉目所見的風景如實地映照於文本內，創作者「凝視」和「書寫」的空間，也構成個體生命隱喻的載體。（見附錄）因此，賦作中空間的營造有部分既是創作者精神上(肉體)苦難的源頭，也是理想世界的投射。

當然，言及空間，絕不能忽略時間命題的陳述。時間乃是吾人啟發生命存有與意義的媒介。同時也是個人生命觀的容器，更能結合空間面向，深化放逐意識的議題層面。清代臺灣賦中的時間，是書寫的內容物，也具有想像和現實的形態，同時透過大量的歷史事件的再現，締結出「史詩」的觀念結構。從中，也可看出書寫者對於時間的定義和歷史的解讀，亦延伸出史詩意象(epic image)的書寫與重構。史詩是探討歷史事件真諦的產物，也是作者時間意識的延展。書寫/思索歷史，是闡釋時間的形式，但選取的觀點，則為此一問題的核心。而「史詩」也是臺灣賦中貫串創作核心的主流意象，藉由歷史事件的再現與民族精神的展現，構成放逐意識中「懷思」(nostalgia)的命題。文本中堆砌的歷史事件是文采與知識的展演，同時也是政治認同的檢視。對於身處歷來被視作流放之地的文人群體而言，透過此一詮釋展現出渴求回歸主體的意圖。這既是「文化鄉愁」(cultural nostalgia)的衍義，也是放逐意識中必然的歸趨。

而回顧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無論是山川景物的描繪、個人情緒傳達的媒介、線性時間的想像或定點空間的漫遊，皆呈現出由內而外的空間活動，同時，也是個由外向內探尋生命意義的表述。

附 錄

解析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⁴⁷

作者 篇名	說明
林謙光 (福建長樂人，康熙 11 年副貢生，任官政、教諭與延平府教授) 〈臺灣賦〉	清代臺灣賦中首篇以「臺灣」為題的創作，「假借汗漫公子和廓宇先生的對話來開頭，並以中國大陸風景不如臺灣雄奇來襯托出臺灣的形勝之美。」(頁 46)作品寫實呈現臺灣的地理特色，於結尾處彰顯教化意義：「崇儒重道，勿棄蒙顚。匪棘其欲，式廓厥埏。皇以蒞之，於斯萬年。」(頁 49)
高拱乾 (陝西榆林人，來臺時間約康熙 30 年至 34 年，任福建分巡臺廈道兼理學政等官銜。) 〈臺灣賦〉	深入描寫臺灣地理景觀與原住民，但仍有許多神話想像，如「貝文似鳳，魚首如人。大龜之壽三萬歲，蝴蝶之重八十觔。」(頁 53)可是，「文中多了一份思鄉之情。…與林謙光『廣布文德，弘宣湛恩』那種希望弘揚聖德的心態有很大的不同。」(頁 51)也因為有濃厚的思鄉之情，「於山則見太行之險，於路則見蜀道之難。於海道之難上難，險上險，普天之下望洋興嘆者，吾知其無以過乎臺灣！」(頁 54)臺灣成為思鄉情緒中的一個惡地。
周澎 (福建晉江人，曾為施琅帳下，翰墨盡出其手。) 〈平南賦〉	「周澎以施琅〈平南奏疏〉為底本，加上自己的潤色，作〈平南賦〉一文。先以天子憂心海疆不靖，特命施琅專事征伐，以求平定臺灣發端。」(頁 55)並且，以虎和蛟鯨來形容臺灣亂民，臺灣猶如為滿清王朝所放逐的邊緣空間，同時，亦有描寫戰爭場面，如「橫驚波以代鼓，撥瘴霧以揚旗。各星羅而綦布，聽中堅之指麾。」(頁 57)藉以宣示道統：「斬毒鼈兮奠滄海，吁嗟偉烈兮斗漢爭高！」(頁 59)
李欽文 (臺灣府治東安坊人，康熙 60 年歲貢生，曾任福建南靖訓導。) 〈紅毛城賦〉	「紅毛城即赤崁城，也就是熱蘭遮城…本文是以紅毛城的歷史沿革、景觀特色兩方面，來呈現紅毛城的風貌。」(頁 60-61)，亦提及臺灣(臺南一帶)會被荷蘭殖民與鄭成功收復的歷史。再者，「地屬東南之極，星分牛女之墟」(頁 61)以星宿來譬喻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地理區隔。結尾仍有對於清帝國俯首與教化意味之存在：「祝金甄之永固兮，萬壽無疆。」(頁 64)

⁴⁷ 表格中引文，皆出自許俊雅、吳福助主編的《全臺賦》，僅於文後標明頁數，不另行標示隨頁註。

作者 篇名	說明
周于仁 (四川安岳縣人，雍正 11 年為澎湖通判) 〈觀海賦〉	描寫澎湖海域，「尤其詳敘『黑溝』、『紅溝』這兩處奇景，頗富海洋科學參考價值。」(頁 65-66)，其中也道出作者個人仕途歷程之流轉遷徙。「憶余春秋，五十有五。謁選屆期，再治我輔。」(頁 66)，結尾仍有教化意味的存在：「當明聖之世，而堯舜乎斯民？獨鄙人識闇而才疎兮，愧有志而未能。」(頁 67-68)
張從政 (臺灣府治東安坊人，雍正元年臺灣縣恩貢生，乾隆 5 年分修府志。) 〈臺山賦〉	本篇描寫臺灣山脈的景觀和地理，「分別從臺灣南路、北路山脈來描繪臺灣山岳。文章一開始提到『脈固發於閩嶠』，則是清初文人習慣，將臺灣的山脈、物產與番人都與福建連接，試圖將臺灣與中國大陸連為一體。」(頁 72)本文亦有描寫山上原住民的生活景象，同時也將臺灣山脈想像為別有洞天的神話仙境：「別有內山荒島，獮窟蛟宮。瘴氣駭目，陰氣蔽空。…奇獸珍禽，多《爾雅》所未箋；嘉樹雜植，更《山經》所難述。」(頁 74)結尾仍有教化與認同的意味存在：「維盛世之修嘉兮，…為海東之砥柱兮，亘萬古而永峙。」(頁 74)
張湄 (浙江錢塘人，雍正 11 年進士，乾隆 6 年任巡臺御史) 〈海吼賦〉	描寫滔天海浪的氣勢，「海吼，為海濤拍岸之聲。」(頁 75)描寫海浪的氣勢磅礴，「張湄為浙江錢塘人，對有名的錢塘潮應有深刻印象，所以見臺灣海潮的洶湧，不免寓思鄉於海潮之中。」結尾有鄉愁的意味存在：「悵落葉於始波，感吟蟲於將夕…」(頁 77)
陳輝 (臺灣縣人，清乾隆 3 年舉人。) 〈臺海賦〉	講述剛收復的臺灣海域的地理概況，如島嶼分布或自然生態，「並將臺灣海產魚類誇飾描寫，讓人感受到台海之奇特，…並用鏡子來比喻海面，從港口向海洋望去，足以開拓心境。」(頁 78)
王必昌 (1704-1788，福建德化人，乾隆 16 年受魯鼎梅之邀，修《重修臺灣縣志》。) 〈臺灣賦〉	此作為清代臺灣賦中篇幅最長的一篇，寫作時間為乾隆 16 年至 17 年之間。作者王必昌曾參與清代臺灣方志的《重修臺灣縣志》纂修工作。除了參酌前人的兩篇(臺灣賦)之外，「更加強對臺灣物產的描繪，如海、陸動、植物，甚至對臺灣歷史上的名人有所述評。其他像是番俗、天災、臺灣人民的原鄉也都有說明，包羅萬象，堪稱清代臺灣的百科全書。」(頁 82)
王必昌 〈澎湖賦〉	為清代首篇以澎湖為名的賦作，主要描寫澎湖的物產和風土地理。「全文辭藻華贍，音韻諧美，寫作時間約略與其〈臺灣賦〉接近。」(頁 88)文章結尾仍然喻有政治教化的意涵：「臺澎既接乎中邦，島嶼詎埒於異域。文明瑞應，魚躍三千而燒尾；海宇

作者 篇名	說明
	風同，鵬培九萬而搏翼。颺帝治之光華兮，忘知識於帝力；慶享王之偕來兮，胥會歸其有極。」(頁 89)
卓肇昌 (臺灣鳳山人，乾隆 5 年拔貢，曾擔任《重修鳳山縣志》之「參閱」一職。) 〈臺灣形勝賦〉	本篇為描寫臺灣地理的山川景色之作，「臺灣形勝，乃指臺灣風景絕佳處。形勝，泛指風景優美處。…此篇〈臺灣形勝賦〉將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彰化縣與澎湖廳等五地的形勝分別描寫，…另外尚有荷蘭人一牛皮借地、仙人山仙人對奕等傳說，使形勝更添加神話色彩。」(頁 97)開篇亦以星宿形容臺灣/中國大陸的區隔：「郡號臺灣，古傳昆舍。星分牛、斗之墟，地當閩、越之跨。」結尾亦有呈現教化觀：「洪惟我皇，應昌期，承休命，九有廓增，四方域正。」(頁 101)
卓肇昌 〈鼓山賦〉	鼓山，即打鼓山(打狗山)，《鳳山縣志·山川》有所記載。結尾一改歌功頌德的模式，「轉而將寫作重心放在所描寫的事物上。」(頁 103)
卓肇昌 〈鳳山賦〉	清代臺灣鳳山縣以此山作為命名，「主要以頌揚為主體，以鳳山之形勝歌詠皇帝。」(頁 105)
卓肇昌 〈三山賦〉	從此賦中「可以發現臺、澎諸島在文人的心目中，已非之前所言『溟渤奧區，蛟鯨出沒』的惡地，而是轉變為海外仙境，蓬萊仙島般的世外桃源。」(頁 107) 本篇神話色彩濃厚，亦將臺灣想像為神山(蓬萊、方丈…)，結尾仍有教化和服膺道統的文字：「雖荒渺之神山，胥效靈於帝闕」。(頁 108)
林夢麟 (臺灣鳳山縣人，乾隆間生員，曾擔任《重修鳳山縣志》之校對工作。) 〈臺灣形勝賦〉	開篇仍述明臺灣/中國地域的不同：「在水一方，在地蘊藉。域處東南之濱，星分牛女之舍。」(頁 114)文中亦描繪臺灣府八景，「另有軍事要塞，形勝險要之處的涵義。」(頁 114)同時具有歌功頌德的功能：「民盈滿而熙皞，道大同以光華。鄒魯文風，望甄陶於繼起；唐虞化日，願頌祝於靡涯。」(頁 115)
章甫 (1760-1816，本為福建泉州人，後遷居臺灣臺南，嘉慶 4 年歲貢。) 〈臺陽形勝賦〉	作品格局比清代先前的形勝賦還要小，主要重心著重於臺灣府城中心，「不僅描寫臺灣風景，也鋪陳臺灣形勢。」(頁 119)再者，也提及文人從「臺灣」兩字猜測地名之由來。

作者 篇名	說明
黃學海 (1806-1846，噶瑪蘭廳人，道光6年取進淡水廳學。) 〈龜山賦〉	作者為噶瑪蘭廳人(今宜蘭)，本篇作品即描寫龜山島，「在作者的妙筆摹繪之下，宛如靈龜出遊，活靈活現。」(頁 127)例如「尾搖曳而若伸，足蹣跚而又止。蒼松鬱其文鱗，皓石連其貝齒。」(頁 127-128)文章引述老番言龜山壁崩，漢人必來之傳說。也因為如此，使得土地得以開墾，人民得以教化：「斯誠蘭地開屏，特萃坤輿之間氣；從此瑤光烜采，益徵文運之宏開。」(頁 128)
李祺生 (道光年間人氏，曾參與《噶瑪蘭廳志》修訂。) 〈龜山賦〉	為清代第二篇描寫龜山島的賦作，「內容上可見模仿黃學海〈龜山賦〉的鑿痕。」(頁 178)，開頭將之描繪為臺灣的名山：「維臺海之名山，實蘭疆之鉅鎮。」亦有神話色彩的鋪陳，後段敘遠在中國長江三峽也比不上龜山島週邊海域的氣勢：「彼夫瞿牛峽口，龍首山隈。絕少瓊奇之概，空傳瀛瀆之堆。」(頁 180)
楊浚 (1830-1890，福建晉江侯官人，咸豐2年舉人，同治8年來台遊歷。) 〈澎湖弔古賦〉	澎湖於軍事戰爭中重要的地理位置「字裏行間流露作者在敘述歷史事蹟的書寫中，所寄寓的悲慟心情。」(頁 237)如：「維彼澎湖，魯王故府，監國僅及七年，明社猶存片土。」(頁 238)即言及南明王朝和五妃之遺事。最後抒發個人的歷史之懷：「一將全忠，笑史官之闕筆；五妃並命，尋王室於荒埃。問津欲倩漁郎，卅六島如聞腥臊；銜石不勞精衛，三千年重話劫灰。」(頁 239)
楊浚 〈澎湖弔古賦〉	「作者再就澎湖弔古為題。兩賦主題相仿，但此篇文字簡鍊、對仗工整，更著重聲情之美。…篇末以相關的降表，象徵澎湖所歷經的人事更迭滄桑。」(頁 240)開頭亦將澎湖列島想像為徐福求仙藥之仙島，「童女三千，誤乘舟於徐福；壯夫五百，痛穿冢之田橫。有客告我，是為臺灣」(頁 240)。並繼續陳述南明王朝之舊事，抒發歷史感懷。
附錄 沈光文 (1612-1688，浙江鄞縣人，為民明朝之遺民，曾任太僕寺卿，後以教學為業。) 〈臺灣賦〉	沈光文的〈臺灣賦〉，據學者盛成〈沈光文研究〉一文中指出，諸多清代的方志(如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所收的皆為偽作。因此，盛成經由對照考證，據〈平臺灣序〉抽出〈臺灣賦〉一文，增補為〈臺灣賦并註〉。但是，「其中增補的部分，是出自盛成的手筆，僅能視為盛成個人的『擬作』。」(頁 528)不過，此篇〈臺灣賦〉仍具有參考價值，因為，此賦作「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繪，誇張繁富的鋪陳，從而形成了超時空體的，一幅縝密精緻的圖案式長卷。」(頁 528)以細緻的描繪方式，鋪陳臺灣歷史、地理和物產、風俗。而結尾處仍有教化意味：「一統之洪圖，故得天露而效順也，民實皇民之赤子。白叟黃童，永欣舜日；男耕女織，終慶堯年。」(頁 53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 漢·高誘注，《戰國策》，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7。
- 明·朱棣集註，《金剛經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郭慶藩輯注，《莊子集釋》，臺北：漢京文化，1983年。
- 清·劉良壁，《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中文部分—論著

- 屈萬里（1972），《尚書釋義》，臺北：華岡文化出版部。
- 侯作珍（2007），〈臺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〇到八〇年代為探討中心〉，《文學新鑰》，6，頁 27-41。
- 范銘如（2008），《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社。
- 曹永和（1979），《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2006），《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 遂欽立輯校（1991），《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學海。
- 楊伯峻（1991），《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
- 楊伯峻（1992），《孟子譯注》，臺北：五南。
- 楊伯峻（1992），《論語譯註》，臺北：五南。
- 楊家駱主編（1993），《新校本史記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
- 廖美玉（1992），〈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自我放逐意識——由幾首「佳人」詩談起〉，《成大中文學報》，1，頁 211-232。

- 廖炳惠 (1982),〈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中外文學》，10(10)，頁 134-146。
- 廖炳惠 (1991),〈放逐與政治〉，《聯合文學》，7(3)，頁 34-37。
- 魯 迅 (1991),《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謝崇耀 (2002),《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
- 簡政珍 (1991),〈放逐詩學——臺灣放逐文學初探〉，《中外文學》，20(6)，頁 4-24。
- 關永中 (1997),《神話與時間》，臺北：臺灣書店。
- 保羅·繆遷(Paul Merchant)著，蔡進松譯，(1973)，《論史詩》，臺北：黎民文化。
- 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1990)，《存在與時間》，臺北：桂冠圖書。

外文部分

Hawking, S. W.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Books.

Exile Ideology in Taiwan Fu of Ching Dynasty

Mei-Ching Lin*

Abstract

Exile is an important generic subject of literary creation. For composition, any subject matter is the product of exile, since a self-wandering spac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twining real and surreal for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ile ideology” in Taiwan Fu,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writing” as a starting point,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exile with metaphysical points of view, and producing multiple conversations. Also included is the analysis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ntext of exile ideology. The ‘epic’ aspect, as a result of the molding, is the acme of expression of the exile ideology and the core expression of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The intellectuals who came across the Strait (or who were native) to Taiwan used Fu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idea and, at the same time, engendered a double-faced psychological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by depicting the native products, custom, and history, we are able to peak into the cultural nostalgia felt by the intellectuals toward China (the Ching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having inspected over time, the exile ideology in Taiwan Fu expresses nostalgia in culture homage and the intention of desirous home-coming. Thos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felt exil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China sought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in the quarters of literary creation, constructing numerous eerie and magical spectacles, and implying the room of imagination for paradise like Tao Hua Yuan. Whether it is the depiction of scenery or display of native products, or the wandering in the reversal of linear time and fixed-point space, the exile ideology of Taiwan Fu is itself an inside-out extending movement of space and an expression of inward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without.

Keywords: Exile Ideology, Ching Dynasty, Taiwan Fu, Space, Time, Epic

*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ching@mail.cgu.edu.tw.